

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的 签订对世界局势的影响

罗 志 刚

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法西斯签订三国同盟条约,正式建立军事政治同盟,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上的重大事件之一。它对整个世界局势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现代国际关系史上划出了一个新的阶段。

德、日两国仗恃三国同盟这一侵略阵线最终形成,加紧协调侵略行动,积极准备进行新的战争冒险,使世界大战朝着全面战争的方向发展,这是三国同盟条约对世界局势产生的最主要的影响。

德国法西斯早有征服苏联的侵略意图。1940年7月,希特勒的侵略计划就转到了对苏作战方面^①。但是,德国要进攻苏联,首先必须保证自己能够避免两线作战,为东进创造条件。法国投降后,与柏林的愿望恰好相反,英国虽陷入困境,却拒绝与德国媾和,而美国又加紧了军事准备和防御。在这种情况下,德国非常需要日本尽可能在远东牵制英国,阻止美国参加欧洲战争,迫使它减少对英国的支持,而且还需要日本关东军继续在苏联远东边境集结,加强威慑力量,以便牵制和削弱苏联在西线的力量,进一步为德国进攻苏联创造有利的战略形势。在三国条约缔结之前,希特勒对日本能否配合德国的战略意图,并没有多大的把握,这对德国没有立即作出侵苏的最后决定有一定的影响。三国同盟的建立,使德国对得到日本的上述战略配合产生了信心,成为德国决心走上侵苏道路的一个重要的推动器。1940年10月,德国法西斯便开始从西线和其它地区向东方调动军队^②。11—12月,德国总参谋部迅速拟就侵苏方案。12月8日,希特勒签署了代号为“巴巴罗莎”的作战计划,从而最后决定把主要侵略矛头从英国转向苏联。

三国条约的出笼,也促使日本法西斯迫不及待

地要把称霸远东的愿望变成现实。三国条约的墨迹未干,日本近卫首相就在9月28日向人民公开宣扬,德意日三国互相帮助,发挥“军事同盟威力,这也是必然的趋势”^③。日本内阁还讨论了“日本对外政策纲领”,决定以一切手段加强德意日同盟,利用同盟加快建立日本梦寐以求的“大东亚共荣圈”^④。这就是说,日本统治集团从三国全面同盟的形成受到很大鼓舞,要不失时机地利用该同盟加快南进的侵略步伐。日本究竟需要和指望德国做些什么呢?当时,整个远东形势是不利于日本顺利完成南进侵略计划的。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长时间英勇抗击着日本侵略者,牵制和抗击了日本陆军的主力,阻止了国民党政府妥协投降的暗流。这样一来,由于未能解决“中国问题”,日本就迟迟不能实现南进政策。另一方面,美英两国正在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积极采取措施,防止日本扩大在远东的侵略。三国条约一问世,英国政府马上成立远东司令部,于1940年11月13日在新加坡开始工作,统率英帝国驻扎在香港、马来亚和缅甸的陆海空三军部队^⑤。至于美国,在1940年12月显示自己在太平洋的实力后,继续加强美国和日本之间军事基地的力量,增强对日本的经济压力,宣布支持中国的抵抗。事情非常清楚,如果日本积极向南推进,将会引起美英两国在军事上联合对抗的危险。面临这种情势,日本统治集团除了需要取得德国对早日解决“中国问题”的支持外,还需要依靠德意盟国的帮助来加强在今后南进中对抗美英的战略地位,以便使日本有可能全力南进,解决对“日本帝国命运”有决定意义的南方问题^⑥。

出于互利用,以扩大侵略和确立自己的势力范围的共同需要,德日两国充分利用刚刚建立的盟国关系,加强军事合作。1941年春,德日双方代表

频繁接触，紧密勾结。德国政府要求日本在远东积极采取军事行动，敦促它“出其不意地尽快占领新加坡”^⑦。2月23日，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在日本驻德大使大岛会谈时，强调说：日本应该参加大战，这不仅是为了德国的利益，而且也是为了日本“自身的利益”，一旦英国失去在远东的关键阵地，日本就能在世界上这一地区大大加强自己的地位。此外，日本出乎意料的干预，也会迫使美国拒拒参战。他提请日本大使注意：“如果某个时候德国遭到削弱，日本就会在顷刻之间面临一个世界同盟的压力。我们已套在一辆马车上，现在决定着两国人民未来一个世纪的命运，德国的失败同时意味着日本帝国的计划将要遭到破产。”^⑧为了促成日本答应南进，里宾特洛甫希望日本外相松冈洋右到柏林直接进行谈判。希特勒还责成德军统帅部“以现有一切手段加强日本的军事实力”，向日本介绍德国的战术，交流作战经验，在军事经济和技术问题上实行德日合作。德国也指望通过这种援助，使日本对德国提供全面经济援助，首先是满足德国迫切需要的橡胶^⑨。根据3月5日希特勒发布的关于同日本合作的第24号特别命令，德国舰队司令雷德尔上将拟定了关于与日本采取一致军事行动的专门报告。该报告和第24号命令成为即将举行的德日谈判的基础。日本政府对同德意谈判同样寄予莫大的希望，它企图弄清德意两国对英国的真实政策，就某些重大问题和世界政策，协调柏林和东京的共同行动。总的来说，1941年3月27日至4月5日德日双方举行的为期10天的谈判取得了成功。虽然它们由于抱着各自的侵略利益和扩张意图不放，在日本进攻新加坡的时间和苏政策问题上产生了分歧，但在日本推行南进政策这个双方都认为是最重要的问题上基本上取得了一致意见。德国答应帮助日本对美国开战，对于日本来说，这是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大事，使日本进一步坚定了南进的决心。日本感到满意的是，它的南进政策还得到另一同盟国意大利的支持。在柏林谈判期间，松冈曾到罗马和墨索里尼就国际局势和三国同盟缔约国的今后行动进行商讨，取得一致意见。墨索里尼完全赞成日本反对英国的计划^⑩。这一切表明，三国同盟条约签订后，德意日法西斯的侵略野心急剧膨胀，为实现新的扩张计划而进行的紧密勾结程度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从而使整个世界形势更趋紧张化，战争的危险更加扩大和严重了。意大利在三国同盟条约的推动下，为实现建立地中海霸权的狂妄企图，于1940年10月28日派兵进

攻希腊，是这种形势迅速恶化的先兆。

二

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的签订，还迫使过去长期和英法保持密切的政治经济关系，后来又采取亲法西斯立场的巴尔干国家公开同西方大国彻底决裂，完全倒向德国法西斯一边，进一步扩大了法西斯侵略集团。

德国法西斯一向认为，全面控制东南欧国家，是取得侵略战争成功的重要保证之一。东南欧地区自然资源十分丰富，罗马尼亚盛产石油，匈牙利是欧洲最大的铝土矿产地，南斯拉夫和希腊分别蕴藏着大量的铜矿和镍矿。由于这样，德国作为一个资源贫乏的国家，早在准备和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就把东南欧看成自己不可缺少的最理想的原料产地。在农业原料方面，德国对东南欧的依赖也很严重。德国贸易局中欧经济委员会早在1939年9月的报告中就指出：战前德国从海外和欧洲各国输入30亿马克的农产品，现在由英国海上封锁造成的空白应主要由东南欧国家，首先是罗马尼亚、南斯拉夫、保加利亚和匈牙利来填补。这份报告强调，德国只有在“几乎完全依靠东南欧国家”的情况下，才可以解决自己对农产品的需求^⑪。

在德国眼中，东南欧之所以特别重要，还在于它在地理上靠近苏联西部边境，是德国向苏联小亚细亚和非洲进行法西斯侵略扩张的必由之路。正因为东南欧对德国进行侵略战争具有如此重要的战略意义，所以德国早就不择手段地拉拢东南欧国家，力求牢牢控制整个东南欧。法国投降后，德国大大加强了对东南欧的渗透^⑫。三国同盟的建立，意味着法西斯战争势力和战争威胁显著增大，为德国外交组织加强对东南欧国家的压力，实现上述目的打开了方便之门。

争取匈牙利投入法西斯怀抱，是德国迫不及待要解决的任务，德国除了希望匈牙利为它提供充足的粮食外，还指望匈牙利为德军进攻苏联和巴尔干提供交通便利。1940年11月18日，希特勒对意大利外长齐亚诺说，德国需要利用匈牙利的铁路线^⑬。匈牙利霍尔蒂政府怀有扩张领土的野心，不满足于通过德意在1940年6月底“维也纳仲裁”而攫取的特兰西瓦尼亚北部领土，渴望在德国的帮助下，进一步解决对罗马尼亚的领土要求^⑭。从这种贪婪的侵略欲望出发，匈牙利在德国的种种引诱之下，很快靠拢德国。1940年10月7日，匈牙利在柏林的使团

奉本国政府命令，声明同意德军假道匈牙利开赴罗马尼亚，以便“对罗马尼亚军队进行为现代战争所必需的改组”^⑮。匈牙利政府这一行动为自己变成“三国条约”的正式伙伴铺平了道路。11月20日，匈牙利第一个加入“三国条约”。

德国对罗马尼亚不断施加压力，企图使这个国家也早日成为德国侵略政策的工具。1940年9月，罗马尼亚新政府认为，德国在战争中已取得决定性胜利，希望借助德国的支持，能使罗匈两国领土纠纷的解决变得对罗马尼亚有利，并且可使罗马尼亚在跟随德国侵苏的战争中获得领土上的好处，收回比萨拉比亚。在这种意图的驱使下，新政府大力推行与德国联盟的方针。10月，经罗马尼亚政府同意，德国政府派遣坦克师和军事使团前往罗马尼亚，军事使团奉命重组罗军，使它按照“巴巴罗莎”计划作好进攻苏联的准备^⑯。与此同时，希特勒以种种许诺诱引罗马尼亚加快参加三国同盟，他同意向罗马尼亚供应飞机，反坦克炮和其它武器^⑰，答应帮助罗马尼亚收回比萨拉比亚，而且还利用罗匈矛盾大作文章，提出有可能修改“维也纳仲裁”的决议，声称“特兰西瓦尼亚历史的最后一页尚未写完”^⑱。安东尼斯库在德国的威逼利诱之下，向希特勒保证供应德国粮食和汽油，还表示罗马尼亚无条件地和“轴心”国走在一起，准备在战场上为“其”流血卖命^⑲。在这种勾结的基础上，11月23日，罗马尼亚政府签署了加入“三国条约”的公约。

三国同盟建立后，德国政府又立即展开了把保加利亚拉进这个集团的活动。1940年10月，保加利亚政府收到德国要求它参加三国同盟的正式邀请书，受到德国的强大压力。11月17日，鲍里斯国王亲自到贝希特斯加登和希特勒会谈，向他说明保加利亚准备和轴心国进行最紧密的合作，其中包括加入三国条约^⑳。

1941年初，保加利亚首相菲洛夫访问德国，和希特勒举行会谈。希特勒指出，保加利亚参加三国条约，不会遭到土耳其、南斯拉夫和希腊的任何威胁，至于苏联，由于德军驻扎在罗马尼亚，完全可以“保障保加利亚免遭苏联的敌对行动”^㉑。在以后的谈判中，德国政府以保加利亚可获得马里查河和斯特鲁马河地区通往爱琴海的出口为诱饵，终于使保加利亚政府下定参加法西斯同盟的最后决心。1941年3月1日，保加利亚正式加入“三国条约”。

除上面三个国家之外，德国又在1940年11月24日和1941年6月15日，分别把斯洛伐克和克罗地亚

拉进三国法西斯同盟。至此，德国成功地完成了以三国同盟为基石的法西斯侵略集团，占领了东南欧的一切战略要冲^㉒。

由此可见，三国同盟条约的签订，一方面导致德国更加积极展开控制匈牙利、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等巴尔干国家的侵略活动；另一方面又迫使这些国家屈从德国的意志和压力，彻底改变了过去摇摆于轴心和西方大国之间的政策，先后和英国分道扬镳^㉓，正式成为德国法西斯的仆从国。当然，英法对德国侵略政策表现出来的软弱妥协态度，以及法国的迅速败降，也对巴尔干国家的心理和外交产生了不良影响，促使它们投向法西斯侵略阵营。法西斯集团的空前加强，为侵略者进行新的战争冒险创造了必要的外部条件，世界战争的扩大已成为不可逆转之势。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就是三国同盟条约缔结的必然结果。

三

三国同盟条约的签订，对美英中等国的关系也立即产生了显著的影响，进一步推动和加强了反法西斯国家的联合，为日后国际反法西斯联盟的正式形成创造了有利前提条件。这些国家对三国条约的反应和以上巴尔干国家恰成鲜明对照，它们不但没有在大加强的法西斯战争势力面前低头屈服，反而逐渐坚定了对抗法西斯集团的立场，果断地从军事、政治和外交方面采取了一系列较为有力的反法西斯措施，这一点最明显地反映在美国的对外政策方面。

法西斯军事政治同盟建立的严峻事实，表明法西斯国家加剧了扩大战争的危险，从东西两个方面对美国的利益和安全构成更为严重的威胁。因此，美国政府在三国同盟条约刚一出现时，就不得不迅速调整对外关系，使它的欧洲和亚洲政策立即发生重大转折。这不仅表现在美国加紧同日本谈判，破坏法西斯同盟以削弱其力量方面，而且突出地表现在美国加紧实现同英国的经济和军事联合，建立美英联盟的努力上。同样不可忽视的是，就在当时，美国政府已开始改变对日本侵华战争的态度，转而采取一种利用和支持中国抗日的方针。

德意日三国同盟一建立，日本便向美国直接提出了比过去更为大胆的挑战。日本首相近卫公开要求美国容忍法西斯集团实现夺取世界霸权的计划，他宣称：“如果美国对德意日积极合作，以求建立世界新秩序的真实意图不予谅解，那么，美国就只有

参战，而别无他途”^{②4}。在这种日益紧张的国际形势下，美国政府意识到，“美国的处境从未象现在这样危险”^{②5}。美国同法西斯集团的尖锐矛盾无法调和，迟早要卷入两洋作战的漩涡。基于这种估计，1940年9月28日，罗斯福总统在白宫专门召开会议讨论德国和日本谁为头号敌人的问题。在这次会议上，美国领导人通过对国际形势的冷静分析和对比德日力量，决定把德国看作美国的主要敌人，一旦爆发战争，应给予欧洲战场以优先地位。同时，美国政府毫不忽视保卫它在远东的利益。10月4日，罗斯福在有部长们出席的专门会议上明确指出，由于三国条约的签订，出现了异乎寻常的紧张局势。在这次会议上，大家“就远东问题展开了十分热烈的讨论”^{②6}。通过这些讨论，美国政府在思想上加强了对抗德意日法西斯肆意扩张的倾向。8日，罗斯福在会见美国太平洋舰队领导人时，流露出“美国迟早会参战”，以武力保卫美国全部世界利益的意图^{②7}。

但是，美国政府当时并不急于卷入战争。对它来说，特别要紧的是，在世界上占领最有利的军事阵地和获得尽可能多的盟友，为美国将来参战创造最有利的条件。因为它清楚地看到，仅靠美国自己的力量，不可能防止和打败整个法西斯集团的挑战。在美国政府的这种战略计划中，英国和中国占着尤其重要的地位。美国政府打算在欧洲竭力利用英国对抗德国，在远东最大限度地利用英国海上力量和中国抗日力量对抗日本这个潜在的危险敌人。可以这样认为，美国在参战之前，未曾一刻放弃过这种战略意图。

当然，确定以德国为主要敌人，美国政府就得首先重视和加强同英国之间的合作。1940年11月4日，美国海军参谋长斯塔克拟定了代号为“猎犬”计划的长篇备忘录，并把它提交海军部审查。斯塔克在这一文件中指明美国尽可能给予英国物资和军事援助的重要性：“倘若英国能获得对德战争的决胜性胜利，我们就一定会无敌于天下。但如果英国战败，我们就将面临十分严重的困难”^{②8}。11月，陆军部长史汀生、海军部长诺克斯和陆军参谋长马歇尔等人，都建议政府和英国举行军事谈判，希望实现美国同英国的军事合作。

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1941年1月底至3月底，美英两国参谋长举行秘密谈判，制订了“ABC—1”基本战略计划。这一计划主要反映了美国的利益和战略观点，但也符合英国的利益和战略要求，它确定德国为头号敌人，在日本参战的情况下，美

英在太平洋的军事行动依然属于防御的性质^{②9}。“ABC—1”计划决定了两国在整个战争时期的主要战略方针和军事合作的基本体制^{③0}，表明美英的军事合作关系从此开始。

从1941年初起，美英互派军事代表团，在北爱尔兰和太平洋的英国属地开始为美国武装力量建立军事基地，美国空军军官被派往英国选择修筑空军基地的地点。美国政府宣布红海为非作战区，从而有可能把武器装备直接运往远东和埃及，改善英军的供给。

美国第二次修改中立法，既是针对法西斯集团疯狂挑战的回击，又是建立美英更密切合作关系的极为重要的步骤。1940年底，英国因国内的财政状况濒临危机边缘，对美国武器和军事物资支付现款的能力越来越受到限制，这成为英国能否继续抵抗德国的一个关键问题。12月8日，丘吉尔写信给罗斯福，正式提到英国不久难以用现金支付美国的船舶和供应品^{③1}。罗斯福迫切感到，“现购自运”原则无论如何也不能达到最有效地利用英国抵抗和削弱德国的目的，必须立即加以修改。1941年1月10日，美国政府将租借法案提交国会审批，建议以租借形式把武器和物资转交给英国。此法案在国会中引起长达两个月的激烈辩论。结果，新法案的拥护者们击败了孤立主义者，租借法案在国会通过。3月11日，罗斯福签署了这个法案，当天，新法案对英国生效。租借法案的通过和生效，固然是美国垄断资产阶级加紧对付法西斯集团空前战争威胁，维护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的产物，但在客观上有助于将美国的工业和财政资源用于援助反法西斯国家反对法西斯侵略阵营。因此，它不仅把美英的军事、经济和政治合作推向一个新的高峰，促使美英两国联盟基本形成，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法西斯同盟的阵地。

另外，美国政府也准备联合英国对付日本南进的威胁。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根据拟定的远东防御战略，避免在欧洲战争结束之前，大规模增强自己在远东的武装力量，这一点早在1941年初美英军事谈判中就有明显的反映。当时，美方代表拒绝了英方提出的派遣美国太平洋舰队到新加坡，由英美共同防御该地区的建议。美国采取的策略是联合英国对日本进行“有限”的阻击，主要任务是通过经济封锁，使日本丧失马来亚的供应基地，破坏日本和西半球之间的交通线，从而削弱和摧毁日本的进攻能力；如果日本发动进攻，就把英国推到远东第一

线。为此,美国向英国表示,它准备在大西洋和地中海地区增加自己的兵力,使英国能够从这些地区抽出军队去加强它在远东的阵地^②。毫无疑问,三国同盟条约的缔结,是促使美英关系迅速加强的一大因素^③。

三国同盟条约签订后,美国政府鉴于日本南进的可能性急剧增大,明显加强了对中国问题的关注。罗斯福利用再度当选总统的机会,第一次坚持要由白宫来掌握对华政策。为了全面掌握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情况,罗斯福应国民党政府的要求,于1941年1月向重庆派出了自己的助手克里博士去研究中国的实际现状^④。美国政府这样做,不仅是因为它决不甘心失去中国这个势力范围,也是因为中国在美国的远东防御中日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中国巨大的人力资源,中国人民的英勇抗战,使美国政府完全有理由认为,中国的抗日斗争在牵制日本军事力量、阻止和延缓其扩张方面可以发挥极大作用,是日本南进道路上的严重障碍。因此,紧紧抓住中国不放,不让日本独占中国,“把中国变成在军事上和政治上都对美国有益的盟国”^⑤,就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根本目标。1940年11月26日,美国政府在国务卿赫尔转交给日本驻美大使野村的美日协议草案中建议:“日本政府从中国及印度支那撤退所有陆海军及警察武力”^⑥。另一方面,美国采取各种措施支持国民党政府,指望通过它达到控制和利用中国抗日力量的目的。1940年10月,美国同意英国重新开放滇缅公路^⑦。11月30日,汪精卫傀儡政权同日本缔结了卖国协定,为日本政府所承认。当天,美国政府便作出反应,表示除重庆政府外,拒绝承认中国的其它任何政府。同时,美国还为国民党政府提供了一亿美元的贷款^⑧。随后,美国又在飞机方面给予了援助^⑨。从1940年12月起,美国政府开始和国民党政府共同制订一项秘密空中战争计划^⑩。不过,美国这时拒绝和中国正式建立同盟关系,它不愿因同盟关系而对中国承担过多的援助义务,只打算把这种援助尽量限制在政治和经济方面。尽管如此,还是应该看到,美国从利用中国反对日本侵略扩张,维护美国远东利益的自私目的出发。在三国条约签订后已开始放弃对绥靖政策的幻想,而转到支持中国抗日这方面来。1941年5月,租借法案对中国生效后,美国正式走上支持中国抗日的道路,使欧洲、亚洲和非洲的反法西斯阵地初步紧密连成一体,为建立国际反法西斯联盟奠定了基础。

由于德意日通过签订三国条约组成联合侵略阵线,苏联受到法西斯集团东西夹击的可能性比过去更大。1940年9月30日,“真理报”不安地写道:三国条约所造成的后果,将“使战争愈打愈烈,使战火蔓延得更广”。苏联有理由担心,这个同盟的建立也是针对自己的。面对这种危急的国际形势,苏联政府在“中立”政策的掩护下,更积极地展开频繁的外交活动,力图最大限度地改善同其它国家的关系,打乱法西斯国家扩大侵略集团,包围和准备进攻苏联的计划,为抵御法西斯的入侵创造有利的外部条件。

苏联向许多国家提议缔结互助协定。保加利亚政府在希特勒的外交压力下,拒绝了苏联的提议。经过苏联政府的努力,1941年4月5日,在莫斯科与南斯拉夫签订了苏南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苏联政府还采取一些外交措施,来防止邻国成为德国的侵苏基地。1940年10月,苏联向瑞典政府保证,无条件地承认和尊重瑞典的完全独立。瑞典政府也表达了“加强同苏联的友好关系”的愿望^⑪。1941年3月,苏联政府不止一次地发表声明,决不参加任何侵略者对土耳其的进攻,鼓励土耳其不要向德国屈服,但是未能防止土耳其后来采取亲德的立场。

这一时期,苏联虽注意到改善同英美等国的关系,但因要极力避免德国找到早日侵苏的借口,争取更多时间做好反侵略准备,没有立即参加美英同盟。

综上所述,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的签订,直接加剧了世界局势的紧张化,促使资本主义世界进一步分裂和改组,法西斯势力和反法西斯力量处于空前对立的状态,两大阵线划分得更加清楚和明朗了。更为严重的是,在三国同盟条约的影响下,法西斯国家在世界力量对比中暂时占居上风,逐步具备进一步扩大侵略战争的必要条件。总之,由于三国同盟的建立,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迅速蔓延到整个世界,一场真正世界性的全面战争已是不可避免的了。

注释:

① 戈登·赖特:《总体战的苦难》,纽约1968年版,第33页。

②③ 杜尚·卢卡奇:《第三帝国和东南欧国家》,第2卷(1937—1941),贝尔格莱德1982年版,第423、419页。

④ 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第1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56页。

④ 戈尼昂斯基等：《外交史》，第4卷上册，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135页。

⑤⑥ 谢沃斯季扬诺夫：《太平洋战争的准备》，莫斯科1962年版，第301、326页。

⑦ 库达科夫：《日本对外政策和外交》，莫斯科1964年版，第168页。

⑧ 《纽伦堡审判，资料汇编》第1卷，莫斯科1952年版，第402—403页。

⑨⑩ 《德国首要战犯在纽伦堡的审讯》（7卷本资料汇编）第1卷，莫斯科1954年版，第412—413、638页。

⑪ 福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法西斯德国》（1939年9月—1941年6月），莫斯科1978年版，第182页。

⑬⑭ 普什卡什：《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匈牙利》，莫斯科1963年版，第110、107页。

⑭ 参见：《匈牙利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有关战争前夕和战争时期历史的秘密外交文件，莫斯科1962年版，第12页。

⑯ 《德国首要战犯在纽伦堡的审讯》（7卷本资料汇编）第2卷，莫斯科1958年版，第603页。

⑰ 纪佩尔斯基希：《第二次世界大战》，莫斯科1956年版，第135—136页。

⑱ 列别捷夫：《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罗马尼亚》，莫斯科1961年版，第85页。

⑲《德国外交文件汇编》D集第11卷，华盛顿1960年版，第654页。

⑳㉑ 伊斯拉埃梁、库达科夫：《侵略者的外交》，莫斯科1967年版，第128、130页。

㉒ 1941年5月，德国还先后用武力侵占了南斯拉夫和希腊。

㉓ 从德国外交人员向本国政府提供的报告可以看出，三国条约刚一缔结，罗马尼亚和英国的关

系就出现了恶化的趋势。详见同⑲，第260页。

㉔ 库兹涅茨：《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莫斯科1962年版，第154页。

㉕ 特鲁汉诺夫斯基主编：《国际关系和苏联对外政策史》第2卷，莫斯科1962年版，第118页。

㉖㉗㉘ [苏]《历史问题》，1958年第5期，第87、88、99—100页。

㉙ 梅特洛夫、斯涅尔：《1941—1942年联合作战战略计划》，莫斯科1955年版，第40页。

㉚实际上，美国军事当局并未严格遵守这个战略原则。1942年6月中途岛战役胜利后，美国实际投入太平洋战场的兵力超过了欧洲战场。例如，到1942年底，整个美国海外地面和空中兵力中大约有41万1千人在欧洲战场，46万1千人在太平洋战场，见K·K·格赖费尔德：《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战略的再认识》，伦敦1970年版，第123页。

㉛ 参见：麦克尼尔：《美国、英国和俄国。他们的合作和冲突》，上册，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第13页。

㉜ 温·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2卷，商务印书馆1975版，第844页。

㉝ 威廉·L·兰格，S·埃弗雷特·格利森：《不宜而战》（1940—1941），纽约1953年版，第48页。

㉞ 崔可夫：《在华使命。一个军事顾问的笔记》，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95页。

㉟㊱㊲㊳ 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40、74、78、85页。

㊴ 《美国与中国的关系》（附件）下卷，北京1957年版，第394页。

㊵ 让-巴蒂斯特·迪罗塞尔：《外交史》上册，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第357页。

㊶ [苏]《国际生活》，1959年第9期，第92页。